

“摇晃的方法论”

——比较文学美国学派方法论问题与系统论关系初探

宋旭红

【摘要】 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崛起及其对法国学派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 20 世纪西方思想学术主导性思维范式从实证主义向系统论转变的整体趋势。美国学派真正的方法论特色并非是缺乏建构性内涵的平行研究，而是体现了系统思维特征的整体性研究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心化原则等。然而由于特定历史背景等因素影响，美国学派未能明确自身的方法论优势，反而对方法论问题持较为轻视的态度，导致学科在理论化浪潮冲击下陷入自我认知的危机之中。

【关键词】 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实证主义；系统论；整体性研究

20 世纪中期美国学派对法国学派的批判和强势崛起是比较文学学科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以 1958 年美国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大会为标志性事件，勒内·韦勒克（另有翻译为雷内·韦勒克）等美国学者猛烈批评法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对比较文学的当代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学派推动比较文学摆脱欧洲中心主义桎梏、走向全球化发展，大大拓展了比较文学的学科疆域与理论视野，奠定了当代比较文学学科的基本面貌。但是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美国学派的理论建设存在着明显不足，特别是在方法论问题上较为轻忽薄弱，这在一定意义上导致比较文学学科至今无法解决“方法论之根”“不够明确和牢靠”的问题，被形象地称为“摇晃的方法论”^①，从而带来了该学科当代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困境。今天，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陷入相对停滞状态、而作为国际比较文学重要力量的中国学界正在积极寻求理论突破之际，本文尝试从一个较为宏观的哲学方法论角度反思美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方面的问题，努力结合历史语境分析理解其种种主张与表现的深层原因，以期为进一步比较文学学科的当代建设与未来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

一、法美之争：从实证主义到系统论

法美之争的标志性文献是韦勒克在教堂山会议上宣读的《比较文学的危机》。该文强烈批评法国学派使得当时的比较文学陷入“题材和方法的人为的划分，关于来源与影响的机械的概念，文化民族主义的促进因素”三方面“历时长久的危机”之中。^② 这三种危机症状看似涉及多个不同层面，但韦勒克认为其主要根源在于法国学派“把过时的方法强加于比较文学，使之受制于早已陈腐的 19 世纪唯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论”^③，因为无论是梵·第根区分“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将前者缩小为两国文学间的“外贸”关系，还是出于爱国动机将比较文学变成“记文

作者：宋旭红，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songxuhong@muc.edu.cn。

* 本文系第二批国家级一流线下本科课程“比较文学原理”（中央民族大学）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刘耘华：《从“比较”到“超越比较”——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方法问题的再探索》，载《文学评论》，2021（2）。本文大致认同该文开篇处对 20 世纪中后期美国比较文学方法论问题的评判，并借用其中“摇晃的方法论”一词为题以特指美国学派“方法论之根”不够明确和牢靠的种种问题。

②③ 雷内·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载张隆溪编：《比较文学译文集》，28、22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化账的奇怪做法”，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唯事实主义”影响研究方法呈现出的结果。在他后来提到教堂山会议的文章中，韦勒克不止一次地声明：“我所争论的并不是针对一个国家或是一个地区的学派，而是针对一种方法”^①。另一位当年参会的美国学派重要人物哈利·列文也说过，法美之争“远不是法美两国阵线的冲突，而是两代人之间的一个方法论问题——并且是一种成长的表现”^②。这说明法美之争的实质和关键性分歧就在于方法论问题上。

众所周知，法国学派的代表性研究方法是影响研究，其背后的方法论根基则是实证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的实证主义诞生于19世纪30年代，由法国哲学家孔德创立，但其注重经验性与事实性的特征渊源于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实验科学。19世纪自然科学的突破性贡献以及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给西方世界带来了更加繁荣的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实证主义方法也被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哲学方法论。孔德将物理学和生物学研究模式引入对人类社会的观察与研究，创立了全新的社会学学科。这在很大程度上为19世纪60年代以后达尔文《物种起源》与生物进化论思想迅速引起人文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开辟了道路，由此产生出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一系列以“比较”为名、运用实证方法进行跨界比较、强调历史性与科学性的新学科。除此之外，文学艺术创作领域受实证主义的影响更为直接，在法国，写实主义画派和自然主义文学风潮均在19世纪60至80年代风靡一时。但是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摄影术的商业化运用日益普及，无论是以画笔还是以文字逼真再现现实的艺术理念都失去了先锋性存在价值，创作领域的实证主义热潮遂宣告终结。不过在理论与研究方面，实证主义方法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比较文学学科就是在实证主义已经从文学艺术领域退潮的时候开始大踏步朝向正规学科的方向发展的，并且最终由法国学派将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影响研究方法系统化和理论化、成为该学科的第一种主导性研究方法。克罗齐、狄尔泰等人在比较文学创立之初曾经强烈质疑该学科“过时”即缘于此。

当然，我们知道这些质疑并未阻止比较文学的发展，反而激发了早期法国学派构建理论体系的热情。作为法国学派公认的理论家，梵·第根于1931年出版的《比较文学论》一书足以说明影响研究对于早期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性。然而，假如我们把视野放大到比较文学之外，会看到在整个20世纪前期，西方人文学界已经普遍在讨伐实证主义了，形成了一种韦勒克称之为“反抗实证主义”的潮流。在《近来欧洲文学研究中对实证主义的反抗》一文中，韦勒克纵论当时欧洲各国文坛反实证主义的思想潮流和代表人物，其中既有克罗齐、狄尔泰和C.S.刘易斯这样坚守欧洲人文主义传统的大家，也有以瑞恰兹、什克洛夫斯基和雅各布森等人为代表的新批评派、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等新锐力量。^③

作为布拉格学派曾经的一员和新批评派的中坚力量，韦勒克应该是从这股潮流中汲取了思想养分、埋下了日后批判法国学派的导火索。从这一角度来看，比较文学的法美之争其实是与更广大范围内20世纪西方思想学术对实证主义的清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个“更广大范围”事实上也远远超出韦勒克所观察到的人文学界，因为人文学术领域的“反抗实证主义”潮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20世纪西方思想主导性方法论范式从“实证主义”向“系统论”转换的一种表现。

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系统理论的第一位鼻祖据说是提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命题的亚里士多德，但是直到20世纪，该理论才正式成为一门方法论学科并得以盛行。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是国际公认的系统理论重要创始人，他将生物学与行为科学的整体性研究方法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方法论，名之为“一般系统论”。贝塔朗菲曾于1945年发表德语论文提出一般系统论概

① 于永昌等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15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② Harry Levin. "Comparing the Literature". In *Grounds for Comparis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84-85.

③ 勒内·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240-2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念，但是由于当时欧洲的战争环境，此文并未受到关注。20世纪50年代以后，贝塔朗菲旅居北美，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英文著作阐述一般系统论思想，并与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一起创办了“一般系统研究学会”，从此掀起声势浩大的系统思想运动，对20世纪中后期的人文社会科学影响至深。作为一种思维科学和方法论范式，系统论所针对和取代的就是实证主义，这一点贝塔朗菲在其著《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的“修订版序言”中讲得非常清楚：系统认识论与“逻辑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认识论有很大的区别”，后者作为“经典科学的分析程序把分解了的基本要素和单向的即线性的因果关系作为基本范畴”，但是到了当代，“生物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所产生的问题和思想模式，与物理主义和还原论背道而驰”^①。所谓“还原论”是指现代科学致力于用低层级的基本原理来解释高层级复杂事物的方法论倾向，如用物理法则（分子运动）解释化学现象，或者把心理活动归因于生理机制等。这是实验科学的典型特征，但它无法真正帮助我们完成对复杂事物的认识，于是“不管怎样，我们被迫在一切知识领域中运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性问题。这意味着科学思维基本方向的转变”^②。

关于这种“基本方向的转变”，著名物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给出的更加广为人知的概念是“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并且将转换的根本原因归于由科学的“革命”带来的“世界观的转变”^③，即由于20世纪初期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相继确立推翻了牛顿经典物理学世界图景，人们发现“原因和结果仅仅是表象，不确定性才是实在的本来面目”^④。这意味着执着于事实因果关系的实证主义方法失去了解释世界的效力，这才是它遭遇各种“反抗”的根本原因。当然，从科学革命的酝酿发生到世界观的转变和思维范式转换的完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看似与文学艺术领域相去甚远，但其实人文学科所受到的影响超出我们的想象。前述欧洲19世纪文学艺术受到实证主义思潮激荡的例子绝非偶然，科学史家也坦承“起初相对论在人文学科和艺术领域的反响，要远大于其在物理上真正可检验的影响”^⑤，这一点可以在爱因斯坦的传记中得到证实。不过，思维范式的转换并不必然遵循从科学向人文社会学科蔓延的规律，而是完全有可能在不同领域共时发生，比如对“反抗实证主义”阵营诸形式主义流派有重要影响的索绪尔的语言学并不能算是相对论的“反响”，而是与后者几乎同时产生，这意味着在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学界其实是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同步参与并促成了从实证主义到系统论的“范式转换”。雅各布森下面这段话也许最能够反映出形式主义批评受惠于索绪尔、自觉以系统思维取代实证主义的特征：“在共时研究领域，机械堆积材料的观念已经被一种系统或结构的概念所取代。在历时研究领域也是如此……每一个共时性系统都有其过去和未来作为该系统不可分割的结构要素……共时与历时的对立就是系统观念与进化观念的对立”^⑥。

韦勒克在《近来欧洲文学研究中对实证主义的反抗》一文概括了欧洲当时的文学研究新趋向：“他们一方面反映出了某种对综合研究，对大胆的思考，对深入的哲学探索的新的愿望；另一方面还反映了某种从总体性和整体性上越来越贴切细致地分析文学作品的新的意愿。”^⑦应该说这段话表明，西方文学研究界用以取代实证主义的新的方法论倾向正是系统理论，因为贝塔朗菲给系统论下过的一个最简洁的定义就是：“一般系统论就是对‘整体’和‘整体性’的科学探索”^⑧。所谓“综合”“总体性”和“整体性”研究正是系统论最基本的特征。就比较文学而言，尽管得益于“跨界比较”的学科定位以及与文学史的绑定关系等，法国学派在“反抗实证主义”大潮中成功确立并

①②⑧ 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4-5、2、“修订版序言”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

③④⑤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95、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⑥ Roman Jakobson.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Krystyna Pomorska, and Stephen Rudy (eds.). *Language in Literatur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48.

⑦ 勒内·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2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坚守了影响研究的地位,但是各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并非都奉行这一方法,而是存在很多如雷马克所指出的情况,即在理论上推崇影响研究、但在研究实践中却注重综合性研究的情况。^① 20世纪40年代后期,正值美国比较文学在战后迅速崛起之时,英美新批评派如日中天,法国结构主义峥嵘初显。在这些奉行系统思维的新潮批评理论面前^②,极力维护影响研究的理论主张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法美两派的分歧也越来越明显,直至最终爆发论争。

二、美国学派方法论:整体性研究与中心化原则

人们一般认为美国学派在批评影响研究之余,提出了“平行研究”作为替代性方案,并以之为美国学派的方法论特色。然而,如果我们认真检视韦勒克、亨利·雷马克、哈利·列文、韦斯坦因等早期美国学派代表性学者的相关文章,则会发现平行研究并不足以成为取代影响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因为这个词更多的时候是作为影响研究的对立面出现的,学者们着重强调的核心内涵似乎就是“非影响”,就像雷马克所说的那样:“强调的重点在于‘比较’。它可能显示某种关联性,但这种关联性可能与作家A在写作品C时是否认识外国作家B这一问题毫无关系”^③。另外,该词在美国学派创立时期也不是一个具有广泛共识的固定概念,不同的学者会使用一些近似的术语来表达,比如“类比研究”等。因此,平行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建构性内涵的术语,它否定了按照事实联系来确定比较文学研究对象、并运用实证方法的影响研究,但对于如何进行平行研究却未能给出切实明晰的新路径。

根据前文分析,“反抗实证主义”所依凭的乃是新兴的系统科学思维。美国学派崛起之时也正是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在美国生根发芽快速成长时期,那么,他们批评影响研究、提出“非影响”的新方法论原则是否也是因应时势之举呢?本文细察法美之争时期美国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方法论主张,认为他们真正强调的、足以取代影响研究的首要方法论原则并非平行研究,而是最能体现系统思维特征的“整体性研究”。韦勒克不仅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觉察出欧洲文学研究在向综合性、整体性转向,而且高度认同这种转向,到写作《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时更是无比坚定地宣称:“在我看来,唯一正确的概念是一个断然‘整体论’的概念,它视艺术品为一个多样统一的整体,一个符号结构,但却是一个有含义和价值,并且需要用意义和价值去充实的结构”^④。雷马克也认为,不管比较文学在理论方面有多少分歧,“关于它的任务却总是意见一致的:使学者、教师、学生以及广大读者能更好、更全面地把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而不是看成某部分或彼此孤立的几部分文学”^⑤。哈利·列文则赞赏艾田伯的世界主义主张,认为比较文学若不能将世界各国文学纳入比较视野“就不能算是完全实现自己的潜能或目标”^⑥。如果说以实证主义为据的影响研究是一种线性思维,关注从一点到另一点直接因果联系,那么,整体性研究则意味着一种立体性的思维方式,它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选取和对其意义与价值的研判都必须以整体性的文学系统及其特征为参照。但是,关于此“整体”或文学“系统”到底为何,学者们却各自有不同理解,可以指一部作品,也可以指一国文学或世界文学等。

与整体性研究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方法论原则是“中心化”原则。作为系统理论的早期形态,一

① 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载张隆溪编:《比较文学译文集》,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② 近年来有西方学者认为系统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可以追溯至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文学社会学。参见Steven Toetses de Zepetnek. “Systems Theorie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015, 67 (1): 1.

③ 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载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7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④⑤ 雷内·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载张隆溪编:《比较文学译文集》,3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⑥ Harry Levin. “Comparing the Literature”. In *Grounds for Comparis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83.

般系统论（GST）所讨论的系统是有着内部清晰结构、并不断与环境产生能量或信息交换的开放性系统。这种系统的演化遵循“渐进中心化”原理，即在系统众多要素中会产生出一个起主导作用的要素成为系统的中心。系统整体特征及其各要素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中心，比如人体的大脑、原子中的原子核、太阳系中的太阳等。因此，“中心/边缘”认知模式也是系统思维的典型特征之一，是对系统整体性研究的进一步展开。类似的思维模式我们在美国学派的理论主张中时常可见，比如亨利·雷马克在总结教堂山会议法美之争时指出：“美国比较学派的实质性主张在于：使文学研究得以合理地存在的主要依据是文学作品，所有的研究都必须导致对那个作品的更好的理解……到目前为止比较文学领域时兴的许多研究所探讨的都是文学的那些边缘问题，它们不是越来越接近文学艺术品，而是越来越背离它”^①。不过，由于每位理论家对文学系统的理解不同，他们所认定的比较文学研究之“中心”要素亦不相同。雷马克所要求的以作品为中心看似与其他美国学派学者一致，但综观他的理论主张，他心目中最大的系统应该是包含文学系统在内的“人类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这是他主张“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前提。在这个大系统中，他所强调的作品中心地位是相对于影响研究过分沉迷于历史考据而言的。与之相比，韦勒克当然也是作品中心论者，但他较多受到罗曼·英伽登的影响，“把一件艺术品看做一个层次的系统，这个系统包括了从语音模式直到整个作品表现出来的形而上学性质”^②，也就是说把每一部作品看作是一个系统，则其中心要素就不再是“作品”，而是“文学性”，他视之为“文学艺术的本质”和“美学中心问题”。^③ 还有的学者未明确表示过自己的文学系统观，但从其研究实践中我们也可发现他们的主张。比如，韦斯坦因提倡体裁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该领域可以实现文学史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融合，这说明他所期冀的文学整体是三种研究传统的统一、而非孤立强调任何一方，而体裁在其中就可以起到中心要素的作用。

刘耘华在讨论平行研究的困境时曾指出区分“方法”与“方法论”的重要性。^④ 如果说“方法论”是基于对某一学科的本体论认识而形成的关于研究方法的整体规划，而作为具体研究手段、工具、途径或视角的“方法”则是方法论的具象化、语境化和实操化。不过在笔者看来，在方法论的背后往往还有更为根基性的、基于特定时代世界观的哲学认识论或思维科学。比较文学自诞生就因“比较”二字的方法性内涵而被嘲讽为“没有独特的方法论”，但事实上这个嘲讽本身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现代学科体制基本是以特定研究对象为依据来划分学科界限的，鲜少有学科敢于宣称自己拥有独一无二的方法论，其原因在于方法论问题涉及人类基本的思维运作方向与运作机制，具有极大的普遍性。有当代系统理论家把系统论称之为“可以谈论其他学科”的“元学科”就是这个道理。^⑤ 不过，反过来说，任何一种普遍性的哲学方法论原则或思维方式在进入某一具体学科或研究领域之后，势必会与特定研究对象或研究目的相结合，从而催生出更具可操作性的方法论体系或路径，但这个过程往往需要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和相应的理论建构方能明确。比较文学相比于其他文学研究领域的独特性在于：它的“跨界”属性既是对研究对象的界定，又有着强烈的方法论诉求，因此，该学科理应最为重视方法论建设。然而，正如学者们抱怨的那样，美国学派在法美之争中并未真正着力于方法论问题，而是靠不断扩展研究对象的范围来支撑学科发展，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支持比较文学全球化发展，直到21世纪以来对“世界文学”的热议，概莫如是。

① 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载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7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② 勒内·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25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③ 雷内·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载张隆溪编：《比较文学译文集》，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④ 刘耘华：《从“比较”到“超越比较”——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方法问题的再探索》，载《文学评论》，2021（2）。

⑤ 彼得·切克兰德：《系统思想，系统实践》，5页，人民出版社，2018。

如果我们以“方法—方法论—方法论哲学或思维科学”这样的三层结构来观察美国学派的方法论问题,则不难发现:由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是实证主义哲学在比较文学学科的具体表现,因此,尽管有诸多弊端,它仍然不失为一种“可靠”的方法论。这或许也是它能够在“反抗实证主义”的大环境下取得局部成功的重要原因。相反,美国学派提出“平行研究”却既未能给出具体的实操性路径,又未能明确其哲学根基何在,这就使得该概念更像是为论战服务的权宜之计,因而才被视为“摇晃的方法论”而备受诟病。本文通过上述分析认为,从较大的思想语境来看,比较文学法美之争处于西方思想学术主导性方法论范式从实证主义向系统论转换的历史潮流之中,美国学派诸贤在反对法国学派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系统思维模式,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整体性研究”和文学系统“中心”要素的强调。换言之,美国学派的方法论其实也是有着坚实的哲学方法论根基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学派主将们明明已经意识到了法美之争的关键在于方法问题,但是,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的论争期乃至整个20世纪后半叶,美国比较文学始终未能清晰完整地阐明如何将自己的方法论作为学科建设的主要目标,导致比较文学学科逐渐被来势凶猛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化浪潮裹挟,深陷于“学科之死”的危机之中。那么,美国学派为何明明受到系统思维影响、却没有像当年法国学派那样明确依托于系统理论建构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呢?

三、美国学派避谈系统论的原因及其后果

无论是当年美国学派诸贤阐述理论纲领的文章,还是其后学界对美国学派的研究,至今都鲜少有人指出该学派与系统论的关系。这一事实多少有些令人费解。美国是一般系统论的大本营,该理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又素有“人文主义系统理论之父”的美誉,是20世纪中叶所有系统理论家中最为重视人文价值的一位。^①他在北美渡过的20余年学术生涯中与人文社会科学界也有着广泛的接触,甚至他本人和韦勒克还是同乡。但是他似乎始终没有得到美国文学圈的青睐。不仅如此,在美国学派强势崛起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比较文学学者其实已经明确提出过借用当时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科学领域的系统论方法来改造法国学派的一整套理论方案,比如斯洛伐克比较文学家杜里申提出“文学间系统理论”(theory of interliterary system)。该理论认为文学影响关系发生在两个民族文学系统之间,会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不应只强调源文本的权威性;同时他认为借用苏联比较文学的“类型相似”理论,完全可以去研究没有影响关系的不同民族文学等。^②杜里申因此被欧洲学者评价为“为文学关系(研究)提供了系统类型学”新范式的第一人。^③但是直至21世纪初,一向活跃的美国学界也很少有人介绍或回应杜里申的理论。

美国比较文学之所以对系统理论视而不见,除了他们对方法论问题的重视不足以外,或许还有如下原因:首先,特定时代国际环境的影响。一方面,尽管贝塔朗菲创立一般系统论的理论动机之一就是深刻反思纳粹的形成与科学实证主义把人性还原为机器的错误导向有关,但他是战后才来到北美的,因而生前遭遇过不少偏见与不公,与战前即已在美国站稳脚跟的韦勒克不可同日而语。^④如此看

① 一般而言,贝塔朗菲系统论的人文主义倾向植根于他早年对青少年行为科学的研究。对人的成长过程的深入研究促使他强烈反对彼时生物学中“将生命体看作为机器,通过技术来控制现代世界的倾向”。他为此创建一般系统论,目的就是要通过有机论和反还原论的方法,确立富有“责任感、自由意志和人类价值”的“人类新形象”。参见马克·戴维森:《隐匿中的奇才: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传》,19页,东方出版中心,1999。

② César Domínguez. “Dionýz Ďurišin and a Systemic Theory of World Literature”. In Theo D’haen, David Damrosch and Djelal Kadir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 Routledge, 2012, pp. 99–103, p. 105.

③ Pierre Swiggers. “A New Paradigm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oetics Today*, 1982, 3 (1): 182.

④ 据曾与贝塔朗菲一起创建“一般系统研究学会”、并为其作传的美国学者马克·戴维森回忆,贝塔朗菲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曾屡次因战时身处故乡维也纳而遭遇签证、求职被拒的情况。参见马克·戴维森:《隐匿中的奇才: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传》,45、48、57、84–94页,东方出版中心,1999。

来，以后者为代表的比较文学界不公开谈论系统论思想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来自东欧的杜里申的理论又带有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的印迹，自然也不易被冷战时期的美国学界接受。^① 关于这一点，熟悉比较文学史的人们可以从苏联学者聂乌帕克耶娃 1960 年的报告《美国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及其与反动社会学与反动美学的联系》以及五年后韦勒克在《今日之比较文学》一文中对前者的愤怒回应窥见当时的情景。其次，关于科学方法与人文价值彼此对立的某种成见。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在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与社会学家卢曼二人之间的有关社会系统理论的著名论争在很大程度上充分证明并展示了这种对立。^② 在此之前，以韦勒克等人为代表的“新批评”派极力主张高扬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以对抗实证研究的历史主义和科学主义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科学与审美不能兼容的固定认知。在此情况下，很难想象美国学派会积极借助携带科学基因的系统理论来构建自己的方法论体系。

再者，系统论虽自诞生以来深受社会科学的欢迎，但其本身的某些特点也的确使得它不大容易被具有强大而悠久的学术传统的文学学科拥抱接纳，比如彼得·切克兰德所总结的以下两点：其一，系统论是唯一要求“把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集合视为一个整体的学科”^③。换言之，其他的研究方法只提供方法论支持，并不要求改变对研究对象固有属性的认知；但是系统思维的首要秘诀却是要把任何研究对象都视为一个“系统”。这对于习惯了以研究对象为划界依据的现代知识体系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尤其是在面对“文学”这样古老、独特、并拥有丰富知识传统的研究对象时，学者们未必能做到时刻明确地把某部作品或某一层级的文学现象视为“系统”、并严格运用科学的系统方法对之进行分析研究；其二，“‘系统方法’虽然提供了处理问题的方法观念，却并没有向大多数人提供较多有关这种方法的思想内容”^④。这是因为系统理论作为一种“元学科”，是高度抽象的思维范式，而不是具体的可操作手段。这意味着文学研究者们可能在具体批评实践或理论阐述中运用某些符合系统思维特征的方法、甚至提出一些具有系统论色彩的理论观点，但是当研究的焦点始终集中于作品及其审美价值时，方法本身的特征与来源很容易被忽视。

综上所述，美国学派尽管顺应思维方式转换的时代潮流，提出并践行了一些带有系统思维特征的方法论主张，但却囿于特定历史环境或某些固有成见的影响而未能对其展开清晰有力的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比较文学学科无力应对在 20 世纪 70 年代法美论争终结之后迎面袭来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化大潮，从而很快深陷于自我认知的“危机”当中。

根据伯恩海默和苏珊·巴斯奈特等人的回顾与分析，“比较文学系在 70 年代越来越明显地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舞台”^⑤，这一现象对当时比较文学的基本价值构成了威胁。这说明美国学派自教堂山会议以来所倡导的比较文学学科方向在短短十余年之后就陷入了新的困境。在美国，理论化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解构主义的兴起。1965 年韦勒克在《今日之比较文学》一文中再次强调文学研究的使命应该是“理解、阐释和传播文学”，并宣称彼时文学研究者已经“积累了一些新的工具”，这些工具不仅可以用来分析作品的“和声、韵律、措辞、风格”等，还包括从“心理学、哲学、艺术史、社会学和很多其他学科”学到的“新发现”。^⑥ 可见美国学派最初是把各种新兴理

① César Domínguez. “Dionýz Ďurišin and a Systemic Theory of World Literature”. In Theo D’haen, David Damrosch and Djelal Kadir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 Routledge, 2012, p. 105.

② 卢曼与哈贝马斯的论战始于 1968 年，相关文章于 1971 年结集为《社会的理论与社会技术——系统研究提供了什么？》出版，是为彼时蓬勃兴起的系统理论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引发的一场激烈的思想交锋。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继承者，哈贝马斯对卢曼社会系统理论最主要的批评即在于后者旨在描述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却取消了主体性哲学的批判维度。参见于尔根·哈贝马斯：《论卢曼的系统理论对主体哲学遗产的接受》，载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11。

③④ 彼得·切克兰德：《系统思想，系统实践》，5、5 页，人民出版社，2018。

⑤ 查尔斯·伯恩海默：《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45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⑥ 于永昌等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171-172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论当作文本分析的工具。彼时法美之争已近尾声,论争的获胜方美国学派醉心于“内部研究”,因而作为一种“去神秘化”技术的解构主义对他们深具吸引力。但是,由于比较文学的关注点始终在文学性方面,因此对这些新工具背后汹涌而至的思想变局不甚深究。更有甚者,即使是这种对新工具的兴趣在学派内部也会受到批评,比如欧文·艾德礼于1969年发表的《比较文学:问题与方法》一文中宣称:“方法不如问题重要”,因为“问题即文学自身才是可靠的既定之物,而方法‘充其量不过是含混不清的’”^①。到1975年,《格林报告》宣称当时美国比较文学有两大目标:一是支持一种“新的国际主义”,即“以更宽阔的视野看待作家和作品,在全欧洲的范围把握历史运动,在更大的语境之内追索母题、主题和类型,以及对文类和模式做更宽泛的理解”;二是“以世界主义的优势视角来澄清文学批评的重大理论问题”。^②这两大目标突出地体现了美国学派重视“整体性研究”的特征,如果能够引进当时蓬勃兴起的系统理论来建构适宜的方法论体系,应能达到事半功倍之效。然而,由于在方法论问题上的偏见,美国学派任由各种新兴批评方法不断涌入比较文学领域而未加整合,导致理论化危机愈演愈烈,直至新一代学者对该学科发出“死亡警告”。

斯皮瓦克——这位成长于美国学派黄金时期的印度裔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后来成为享誉全球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可以说是“理论化危机”的亲历者甚至制造者。她在《一门学科之死》中谈到的20世纪90年代纽约市立大学的例子,透露出她自身理论转变的关键性契机及其必然性:由于美国自1965年通过《移民法案》后新移民人口倍增,众多来自劳工阶层的新移民学生需要先补习英语。面对这样的学生主体,传统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所主张的那种以高雅英语为母语基础的文本细读法表现出某种“制度上的无能”。与此同时,斯皮瓦克发现这些新移民“为了社会生存与变迁的需要不断地发挥想象”,并且他们的想象“被一种‘双重困境’,即两种帝国主义的极端所贯穿”,因而是极为生动和强烈的。斯皮瓦克敏锐地意识到应该把它“作为一个比较的焦点”,因为在当时,“一种正在经历商品化的英语文化”“已使人文学科变得黯淡无光”。^③其实,倘若以系统论思想方法来观察这场危机,所谓的危机感或许会荡然无存,因为系统理论的精髓在于它不专注于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要素,而是要观察和研究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给系统带来的整体性效果。从以上叙述中可以看出,斯皮瓦克的理论立场从文本细读的“内部研究”转向后殖民主义“外部研究”,这个变化首先是她观察到文学系统中“读者”要素的身份变化引起的,而造成读者身份变化的又是文学之外更大系统中的其他因素如政治、历史等。对于固守作品中心论者而言,这种转变自然是一场颠覆性危机,但是对于如艾布拉姆斯所言由“世界—作家—作品—读者”诸要素共同构成的更大文学系统而言,这只是系统中心要素在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下发生了迁移而已,而这种迁移恰好也可以借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新系统论”——即“耗散结构理论”——的思维模型来加以解释。^④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再次验证了比较文学学科与系统理论的适配性。

除此之外,尽管在法美之争时期美国学派的领航者们或对方法论表现钝感、或未能冲破偏见去建立起一种包含“方法—方法论原则—方法论哲学或思维科学”的完整方法论体系,但比较文学学科自诞生起就已奠定的开放跨界属性使得学科中的新锐力量始终对外部世界的新变化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并展现出方法论创新的巨大活力。这种活力最终势不可挡地冲破了美国学

①② 查尔斯·伯恩海默:《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4、3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③ 加亚特里·斯皮瓦克:《一门学科之死》,13-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④ 耗散结构理论(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与协同论和突变论一起被称为系统论的“新三论”,是系统理论发展到新阶段的产物。耗散结构理论主要创立者普里戈金凭该理论获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此后该理论被广泛运用于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具有自组织特征系统的观察与研究之中。根据这一理论,文学研究从“内部研究”向“外部研究”的转变及其理论化浪潮可以看作是文学系统由于外部环境不断输入新的信息而走向“熵增”(即无序化程度增高的)状态、进而引发整体性变革的过程。

派自制的藩篱，将比较文学带入了下一个“方法比问题更重要”的时代。^①

进入 21 世纪后，“世界文学”话题引发热议，其中，系统理论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比较文学甚至西方人文学科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终于浮出水面。美国学者艾米丽·阿普特认为，系统理论是西方战后“人文学科大理论”的组成部分，对诸多作家、批评家和理论家产生过重大影响。写作《文学的世界共和国》的法国批评家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和意大利裔美国学者弗朗哥·莫莱蒂都是系统理论的受益者，特别是后者“在研究中他使用‘生态系统’这类术语描述其研究对象，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公开承认了文学研究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系统理论和社会科学的世界体系理论之间的紧密联系”^②。尽管阿普特本人对于在比较文学/世界文学论域中出现的系统方法仍然心存疑虑，但无论如何，她的研究开启了美国比较文学正视系统论的历史。作为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界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积极参与、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开始主导比较文学的全球发展，包括关于“世界文学”的讨论。身处理论前沿的学者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方法论问题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性并积极开展理论创新^③，同时也有些研究者注意到系统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不过，到目前为止，比较文学学科关于方法论的研究、特别是关于系统论和新系统论在自身领域的运用与作用仍然是认识不足的。本文认为随着对方法论问题的深入研究，我们对于比较文学的学科属性及其特征会有更清晰的认识，并有望找到处理系统思维方法与人文价值表达之间关系的正确途径，进而对现今比较文学的发展趋势及其前景做出更加准确的阐释与展望。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n the Methodological Problem of the American Schoo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the Systematic Theory

SONG Xuho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Schoo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1950s and 1960s and its triumph over the French School own largely to the shift of the then dominating methodology from positivism to the systematic theory. The primary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 of the American School is not the parallel study that lacks constructive connotation, but the study dubbed as “integration study” reflec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ystematic thinking and the principle of centralization closely related to it. Nevertheless, the American School has failed to clarify its own methodological advantages by taking a relatively contemptuous attitude towards methodological issues, and, as a result, this soon led to the crisis of self-identification in the sweeping trend of theorization in literary study.

Key words: The American Schoo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ositivism; The systematic theory; The integration study

(责任编辑 张 静)

① 查尔斯·伯恩海默：《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5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② 艾米丽·阿普特：《文学的世界体系》，载大卫·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主编：《世界文学理论读本》，144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③ 参见乐黛云：《跨文化方法论初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王宁：《作为问题导向的世界文学概念》，载《外国文学研究》，2018（5）；杨慧林、吴剑：《比较文学研究的问题域和方法论——杨慧林教授访谈录》，载《国际比较文学》，2019（2）；曹顺庆、王超：《“间距/之间”理论与比较文学变异学》，载《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